

銀雀山漢簡文字編

駢宇騫 編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周小瑋
責任編輯：蔡敏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駢字騫編.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7

ISBN 7-5010-1265-2

I. 銀… II. 駢… III. 銀雀山竹簡－匯編
IV. K877.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25745 號

銀雀山漢簡文字編

駢字騫 編著

出版
發行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印刷
經銷 北京安泰印刷廠
新華書店

二〇〇一年七月 第一版
二〇〇一年七月 第一次印刷

定價：一二〇圓

787×1092 1/16 印張：34.25

ISBN 7-5010-1265-2/K·529

前言

一

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文物組在山東省臨沂銀雀山發掘了兩座西漢墓葬（即一號漢墓和二號漢墓），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漢代文物，有竹簡、陶器、漆木器、銅器、錢幣及其他一些隨葬品。其中以竹簡數量最大，其內容多為古代文化典籍，非常豐富，而且十分珍貴。特別是失傳了近二千年的《孫臏兵法》（即《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齊孫子》）的發現，更是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這批竹簡的出土對研究我國古代哲學、軍事學、文獻學、文字學以及古代曆法、書法藝術等都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據兩墓出土的隨葬器物以及墓坑的形制等特點研究認為，這是兩座西漢前期的墓葬。更重要的是在一號墓葬中出土了「三銖錢」和「半兩錢」，在二號墓葬中除出土了「半兩錢」外，還出土了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這就更證明了這兩座墓葬當為西漢前期的墓葬，其上限應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二四年），下限也不會晚於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

這兩座漢墓出土的竹簡，經過整理和研究，已初步明確，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主要是古代文獻，出土編號計有四千九百四十二號（包括殘簡）。其內容可分爲至今仍有傳本的古籍和古佚書兩大類。其中現有傳本的古籍有四種：《孫子兵法》十三篇及四篇佚文，《晏子》十六章，《六韜》十四篇，《尉繚子》五篇。佚書類有五種：《孫臏兵法》（《齊孫子》）十六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論政論兵類五十篇，陰陽時令占候類十二篇，算書、相狗方、作醬法、定心固氣類十三篇。除上述內容外，還有不少難以辨別的殘簡。二號漢墓出土竹簡共三十二枚，其內容爲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排列起來恰好爲該年的全年日曆。

這批竹簡出土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同年五月由山東運至北京，由國家文物局組織了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山東省博物館的同志進行了清洗、編號、照相等工作。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間，羅福頤等先生對這批竹簡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考釋。一九七四年，國家文物局專門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先後抽調了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中華書局、故宮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整理和研究，歷時數年，整理編輯成《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準備分三輯出版。

第一輯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已於一九八五年九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第二輯爲《佚書叢殘》。第三輯包括全部散碎竹簡、篇題木牘及《元光元年曆譜》。由於種種原因，第二、三輯至今尚未出版發行。

關於簡帛的出土，在古代文獻中曾有不少記載，較著名的如《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西漢時期在曲阜孔子宅壁中發現的儒家經典；在《晉書·束皙傳》中記載的「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遺憾的是這些出土物早已蕩然無存。近代簡牘的發現，始於十九世紀末，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在新疆塔里木河地帶出土木簡一百多枚。此後直到一九四九年又曾發現過多批簡牘，出土地基本都在我國西北地區，時代均屬漢晉期間。一九四九年以後，隨着我國考古事業的廣泛開展，簡牘帛書的發現層出不窮，不少戰國、秦、漢簡帛又重見天日。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簡帛的出土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以往。至今見於報道而且重要的有：一九七二年四月發掘的山東省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共出土四千九百多枚竹簡（包括殘片），其內容爲《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晏子》、《尉繚子》、《元光元年曆譜》以及有關軍事、政治、陰陽雜占等古代文

獻。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甘肅省武威柏樹公社下五畦大隊旱灘坡發掘出東漢木簡九十二枚，簡文內容多爲古代醫書。一九七三年，在河北省定縣四十號漢墓中發掘出大批竹簡，其內容爲《論語》、《儒家者言》、《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日書》等古代典籍。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省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掘出竹木簡六百餘枚，帛書四十五種，內容極爲豐富，其中有《周易》、《喪服圖》、《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老子》、《九主》、《刑德》、《陰陽五行》、《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相馬經》、《五十二病方》、《胎產方》、《養生方》、《雜療方》、《雜禁方》、《天下至道談》、《導引圖》、《駐軍圖》、《地形圖》等三十多種古代各類文獻。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間，在甘肅省酒泉肩水金關、甲渠候官（破城子）等處發掘出木簡近二萬枚之多，其中記年簡的上限始於西漢昭帝始元時期，下限至西晉武帝太康四年。簡牘內容可分爲文書類、冊簡類、曆書類等三種。一九七五年在湖北省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葬中發掘出一千一百五十多枚秦代竹簡，其內容爲《秦律十八種》、《編年記》、《語書》、《效律》、《秦律雜抄》、《法律問答》、《封診式》、《爲吏之道》等八種秦代法律文書和兩種《日書》。一九七七年八月，在甘肅省酒泉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中出土了九十三枚木簡，其內容爲漢武帝遺詔

和《蒼頡篇》等文書。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中出土了大批木簡，其內容爲《詩經》、《蒼頡篇》、《周易》、《大事記》、《雜方》、《作務員程》、《日書》等十幾種古代文獻。一九七九年，在青海省大通上孫家寨一一五號漢墓中出土了四百餘枚殘簡，其內容是有關部曲、操典、軍隊標誌、軍功爵賞賜制度和行殺、處罰等軍事文書。一九七九年，在四川省青川戰國秦墓中出土了秦王頒布的《更修田律》木牘。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間，在湖北江陵九店發掘了東周墓葬五百九十六座，其中五十六號、六十三號兩墓出土了大量戰國楚簡，其內容爲選擇時日吉凶一類的《日書》，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數術著作。一九八三年，在湖北省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中共出土一千餘枚竹簡，其內容爲《漢律》、《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日書》、《曆譜》等古代文獻。一九八六年，在甘肅省天水北道區放馬灘秦墓中出土了四百八十餘枚竹簡，內容是兩部比較完整的《日書》。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間，湖北荊沙鐵路考古隊在湖北荊門市王場村包山二號戰國楚墓中發掘出有文字的竹簡二百七十八枚，其內容爲卜筮祭禱記錄、司法文書、遣策等。一九八七年間，在湖南省慈利石板村出土了不少價值很高的戰國文獻簡牘，該墓共出土殘簡四千五百餘片，文字內容爲記事性的古佚書，以記吳國、越國兩國史事

爲主，如黃池之盟、吳越爭霸等。一九八九年冬，在湖北雲夢龍崗六號秦墓中出土了三百八十三枚秦代竹簡，內容屬於秦代法律文書，這是繼一九七五年雲夢睡虎地秦簡之後的又一次重要考古發現。一九九二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在敦煌懸泉置遺址中掘得漢代簡牘共二萬餘枚，內容有詔書、律令、科品、檄記、曆譜、術數、藥方、相馬經、典籍字書等。一九九三年，江蘇省連雲港市博物館在東海縣尹灣六座漢墓中發掘出木牘二十四枚、竹簡一百三十三枚，其內容包括郡級行政文書、名謁、賦、衣服疏、起居記等。其中漢代郡一級簿籍爲首次發現。同年三月，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在江陵王家臺十五號秦墓中發掘出秦代竹簡八百餘枚，其內容爲《效律》、《日書》以及一部過去從未見過的《易占》。一九九三年冬，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在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中發掘出七百三十枚完整的有字竹簡，其內容有道家《老子》甲、乙、丙三種抄本，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傳本；有道家佚文《太一生水》；儒家著作有《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和《語叢》等。一九九四年初，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得一批罕見的不明出土時間和地點的戰國楚簡，其內容有儒家、道家、兵家、雜家等八十多種（部）戰國古籍，其中多數古籍

爲佚書。保留在竹簡上的古籍篇名主要有《易經》、《詩論》、《緇衣》、《子羔》、《孔子閑居》、《彭祖》、《樂禮》、《曾子》、《武王踐阼》、《賦》、《子路》、《恒先》、《曹沫之陳》、《四帝二王》、《曾子立笑》、《顏淵》、《樂書》等，其中《易經》是迄今所見最古老的一種抄本。一九九六年，湖南省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在長沙市五一廣場東側發掘出十餘萬枚三國孫吳紀年簡牘，據報道，其內容可分爲券書類、官府文書和司法文書類、戶籍類、名刺類、賬簿類等五大類。一九九九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在湖南省沅陵縣虎溪山一號漢墓發掘出一千餘枚西漢竹簡，其內容可分爲黃籍（中國早期戶口、田畝、賦稅登記冊）、美食方、刑德等類，其中以黃籍和美食方最爲重要。除上述之外，截至目前爲止，還有一些雖已出土但尚未公布或發表的重要簡牘。這些已出土的簡牘大多數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妥善保管和研究。

二

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爲漢代文人的手抄墨迹，這些文字字體在書法風格上有着明顯的不同。有的結體方整，重心平穩，規整秀麗，筆法古雅；有的草率

急就，自由奔放，波磔顯著，形意翩翩。從字體結構來看，這些墨迹多數爲規整的漢代隸書，有些仍存在着明顯的篆意，還有一部分是較草率的隸書（草隸）。由此可知，這些珍貴的墨迹並非抄於一時，也非出自一人之手。它基本上較系統地反映了秦漢之際漢字演變和發展的一些面貌。

關於隸書的產生，過去曾有幾種不同的說法。許慎在其《說文解字》序中講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他認爲隸書的產生是出於秦時官吏處理法律刑獄等事務的需要，因其涉及徒隸之事，故有隸書之名。同時他還認爲秦書有八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除隸書之外還有幾種字體同時存在。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稱秦時「始建隸書」。其後晉代衛恒在《四體書勢》中說：「秦既用篆，奏書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此外，從漢代以來還廣泛流傳着秦人程邈創造隸書的說法，唐張彥遠《書法要錄》卷七《書斷》云：「程邈始爲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苦思十年，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稱善，用爲御史。關於程邈創造隸書的說法是決不可信的，因爲任何文字的產生都是人們在集體生產勞動和生活實踐中創造出來的，絕非一人所能獨創。李

學勤先生在《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中曾據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編年記》推算，十一號墓主喜卒於始皇三十年，上距秦盡併六國不過四年，看來這批竹簡可能都早於「程邈作隸」。由此可見，程邈「作隸」最多是對當時已存在的隸書作了一番整理，使之進一步得到推廣而已。目前多數學者認為隸書的產生應上溯到戰國晚年。裘錫圭先生在《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中認為：「從考古發現的秦系文字資料來看，「隸書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簡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他在《古文字學概要》中還認為，「秦代既使用屬於古文字的篆文，也使用隸書，實際上是兼跨兩個階段的。秦代使用的隸書尚未完全成熟，可以稱為早期隸書，這種隸書在戰國晚期就已經在秦國形成，到西漢早期還在使用。如果把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劃為古文字和隸楷兩個階段之間的過渡階段，也許更符合漢字字體發展的實際情況」。他認為，到漢武帝時期，「可以看作是隸書由不成熟發展到成熟的時期」。李學勤先生在《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中認為「秦代大量通行的字體必然像秦簡那樣的隸書」。從出土的戰國秦系金文和秦漢簡帛文字資料來看，完全可以證實兩位先生的論斷。隸書的產生確實淵源久遠，戰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文字的應用日益擴大，人們為了便捷，不斷改變大篆、小篆的形體和筆勢，字體筆畫逐漸趨向省減和

平直。在秦漢時期，雖然有些隸書還保存有篆意，但多數字體已經形成了較成熟的隸書。由前一種書體轉變為後一種書體，必然會有一個過渡階段，而新的字體總會孕育在舊的字體之內。處在秦漢這樣一個書體大變革的時期，必然會出現新舊形體混合使用的情況，這也在情理之中。隸書的出現是漢字由繁變簡的一大發展，它解散了篆體，使文字完全改變了圖畫的性質，成為便於書寫的符號，從此文字也就走向了大眾化的方嚮，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着重大作用。

此外，在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還有一部分是飄逸多姿、形意翩翩的草隸，這是研究漢字形體發展和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過去關於草書的起源也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比較有影響的是「起於秦朝說」和「起於漢朝說」。如趙壹《非草書》云：「蓋秦之末，刑峻罔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漢興有草書。」衛恒《四體書勢》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裘錫圭先生在《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中認為：「草書正式形成為一種字體，大概在西漢中期偏後。張懷瓘《書斷》上『章草』條引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把章草跟史游作急就章聯繫在一起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史游的時代倒很可能跟

草書形成的時期相去不遠。」從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資料來看，草率的隸書已經普遍使用，因此，廣義的草書當起於秦代或更早一些。人們在使用任何一種書體時都有簡便易寫的要求，因此就會出現省減筆畫和潦草的寫法，在秦漢隸書開始發展的時期，草率的隸書也必然會隨之出現。隸書形成以後，這些草率的寫法作為隸書的俗體繼續使用，同時又逐漸出現一些新的草率寫法，草書就是在這些新舊草率寫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南宋張栻曾經說過：「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至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的不謹，便成草書。」我們認為此說基本符合實際情況，因為「草書」這個命題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從廣義上講，一切草率的、簡捷的書體都可以稱作草書。一旦文字產生，便會有草書的出現，如早在記錄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的金文里就有簡筆和潦草的字迹存在。所以，在篆書使用時期必定會有草篆，在隸書使用時期必定會有草隸，楷書使用時期必定會有行草。銀雀山漢簡上的「草書」基本上是隸書的潦草速寫，它的書體仍是隸書的結構，所以我們稱之為隸書時代的「草隸」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銀雀山漢墓竹簡上的文字書體，基本上反映了秦漢之際文字及書體演變和發展的面貌，是我們研究漢字發展史和書法史的寶貴資料。過去，無論是研究

文字學的還是研究書法史的都因缺乏漢字由篆到隸的重大變革的真實材料而被困擾，七十年代以後，由於秦漢簡帛的大量出土，填補了過去缺乏真實秦漢墨迹的空白，為解決漢字發展史上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此外在這些竹簡文字中還出現了大量的通假字、俗體字以及押韻語等，這對我們研究古文字、古漢語、古音韻等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三

銀雀山漢墓竹簡所包含的內容極其豐富，自出土以來不少國內外學者已經進行了諸多學科的研究，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很多課題尚待研究。隨着材料的不斷公布，諸如對秦漢哲學、兵法、曆法、數術、文字、文獻、音韻以及簡牘制度、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會進一步開展新的研究。

筆者當年曾有幸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二十多年來，這些珍貴的簡牘文獻深深地吸引着自已。我曾為自已擬定了幾個有關銀雀山漢簡的研究題目，《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即是其中之一。以前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字資料只有少數的金文、石刻等，用毛筆書寫的文字完全沒有見過。七十年代以來，

秦漢簡帛不斷發現，因此編撰簡帛文字編的工作就更顯得有必要。尤其是漢字發展到秦漢時期是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編撰文字編又是古文字學的基礎工作，所以將這一批珍貴的文字資料編成文字編提供給廣大讀者，我以爲其意義就更大了。

該選題本應在銀雀山漢墓竹簡全部發表以後再做，但遺憾的是這批竹簡出土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銀雀山漢墓竹簡》只出版了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尚未出版。好在《銀雀山漢墓竹簡》第一輯已將其主要内容及較完整的竹簡發表，所出現的文字也基本上反映了這批竹簡文字的主要面貌，於是決定提前「施工」，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便利用工作之餘斷斷續續地開始了該書的編撰工作。前後歷時三年，其間甘苦出我意外。至於《銀雀山漢墓竹簡》第二輯、第三輯的材料，只好待其正式出版後再對本書進行增補和修訂。

在該書出版之際，我要特別感謝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及趙東、李聰慧、郝淑慧三位女士，本書所以能順利完成，與他們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在我剛開始準備編纂此書時就得到了傅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並欣然應允無條件使用先生的簡文摹本。趙東同志不憚繁勞，幫我分剪字頭，並編製了本書的四角號碼字頭索引；李聰慧同志幫我粘貼了部分初稿，並編製了筆畫字頭索引；

郝淑慧同志幫助我收集和摘抄了通假字及例句，並復印了大量的參考資料等。如果沒有她們的幫助，恐怕今天還難以將該書奉獻給廣大的讀者。文物出版社的段書安先生和蔡敏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趙超先生爲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謹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作者限於學識，書中未安之處定當不少，懇請讀者多多賜教。

駢宇騫

二〇〇一年勞動節

凡 例

一、本編所收簡文文字均錄自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分單字、殘字、合文、待識字四部分編排。凡原簡文字形體完整或形體少殘而有文字比勘能確認者一律收錄，凡形體殘缺一半以上者一律不收。

二、因原簡照片字迹印刷效果不佳，故採用原書所附傅熹年先生的摹本。爲讀者使用方便，我們將原字放大大一點六倍。

三、本編正文所收單字一千三百六十八字，重文一萬一千九百零八字。分別部居略依《說文解字》，分十四卷編排。每字書眉首列《說文》篆文，如簡文與《說文》篆文形體不同而與《說文》古文、籀文、異體相同者，則書眉字用《說文》古文、籀文、異體，其次爲隸定釋文及簡文。凡《說文》所無之字而形聲可識者，均附於《說文》各部之末，並注明「《說文》所無」字樣，書眉用楷釋隸定。

四、本編所錄簡文文字均據《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注明原簡簡號。凡錄自原簡之篇題木牘者，均注明「題」字，以示區別。